

西洋圖書館發達史 (中世紀)

Jean Key Gates

高 樸 熹 譯

一、前 言

西歐圖書館的發展，在中世紀時，屢遭厄運，天災人禍，層出不窮，使得既有的基礎毀壞殆盡，至為可惜。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的繼承者既無力維持重建的羅馬帝國的完整，西羅馬帝國終於在公元六世紀時淪為入侵蠻族的犧牲品。除了羅馬教皇的教廷以外，西歐集權統治制度終而喪亡。知識和文獻之日趨式微，使得僧院成為西歐唯一保護文化與教育的重鎮。

查理曼帝國的崩潰是因遭受四面八方的侵略所致，此時原來由查理曼大帝及其繼承者所拓展成的統一帝國又沿着先前地理的和部落的界限分為好幾部分。自九世紀經十世紀迄於十二世紀和十三世紀，在軍人和領主階級以及該土地上被征服的農奴之間所存在的個人關係，而形成當時所謂封建制度的社會和政治體系的基础。雖然封建制度自八世紀以來即已存在於法蘭克王國，且深受查理曼大帝支持，但並未見普遍推行，直到十世紀初葉，基於需要保護以對抗蠻族入侵，始呈急需之勢。此一時期戰火連年，僧院乃再度成為西歐文獻與知識之避風港。至於在東方，拜占庭帝國(Byzantine Empire)則正日漸強盛。

十三世紀的社會、經濟、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進步，曾激發起普遍的讀書風氣，從而產生了各種讀物，因未受到戰爭與天災等外力的破壞，依理而論應當早已完成蒐藏及建立衆多圖書館的工作。「百年戰爭」和黑死病疫使得十四世紀成爲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時期之一。據史學家估計，僅僅黑死病一次瘟疫就使英格蘭和歐洲當時總人口傷亡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多。家園和家庭都遭毀壞，由於缺少佃戶或地主和監督者，以致農業停止生產，許多公會都缺少熟練藝匠，貿易呈現萎縮，留在僧院的僧侶寥寥可數，而且學校也已閉關。物價騰漲，為補償戰爭消耗而稅捐加重，在法蘭西和英格蘭境內，反抗苛捐雜稅負擔的農民叛亂風起雲湧。

除此時期，能買得起書籍者唯有王室、貴族、教堂，和大學而已。查理五世(r. 一三六四——一三八〇)以保護藝術和文學而欣譽當世，曾建築一座宏偉的圖書館，該館後來成爲法蘭西皇家圖書館(French Royal Library)的基礎。雖然當時損失甚重，他的兄弟吉恩(Jean)，亦即勃立公爵(Duke of Berry)，築起二十座城堡，並挑選享譽當世的藝術家環繞於其豪華的宮廷中。其蒐藏典籍的狂熱使其成爲歷史上各種稿本蒐藏網羅最多的藏書家之一，在繁富珍藏中有精美插圖的 Books of Hours。英格蘭第一座大型私人圖書館估計藏書在一千冊以上者，就是在此段戰爭與苦難期間蒐集完成的，蒐藏者就是柏瑞(Richard de Bury)，曾任達拉謨城(Durham)主教。柏氏圖書館藏書雖已散失，但是其所著「書迷」(Philobilon)——此書係最早介紹各科典籍的著作之一，告示吾人其嗜書的癡狂，並約略透露其蒐集藏書之秘訣。

二、西方僧院制度

基督教僧院制度在三世紀末期創始於埃及，首經Athanasius引介而傳入西方，繼由聖馬丁(St. Martin)之努力，在普瓦泰城(Poitiers)，法蘭西中西部)，和都爾(Tours)建立宗教據點而有長足進展。其後僧院在高盧(Gaul)以及意大利境內各地如雨後春筍般迅速建立，在蠻入侵、帝國敗亡、時局混亂、社會撲滅之中，僧院形成了一種迥然不同的穩定和安全的生活。由於僧院經常被視爲神職人員的避難所，乃得以常常倖免於戰火，並獲得土地贈與以及免稅等特權。

在西方僧院制度發展史上居於特殊重要地位者即聖班尼第克特(St. Benedict)，他曾在意大利

的Subiaco附近成立數處宗教社區，並在蒙提卡錫諾城(Monte Cassino)建築了一座大僧院(約在五二九年)，班氏選造而有系統地制訂出一套教規來指導僧侶，此套「班尼第克特教規」(Benedict Rules)終而被西方大多數僧院廣泛採行。班氏教規內容係由道德和宗教的箴言以及個人與團體行為的特別誡條，其中包含專心閱讀在內。此項閱讀規定間接表明圖書館的存在，不過早期僧院所鼓勵者完全限於心靈活動的各類圖書，期能直接促進性靈的增長。僧院成爲各種學術研究中心以及宗教暨俗世各種著作的保存所在，則爲六世紀後期的事。此等重大發展都是創始於加西道拉斯(Cassiodorus)。

加西道拉斯，此位在當代可比美於包伊夏斯(

Boethius)的哲學家，歷任東歐德族(Ostrogothic)三代君王，原本希望在羅馬設立一所基督教文獻研究暨傳授中心，以便與傳授異教文獻的類似機構相抗衡。當時加氏此一願望並未實現，及至退休以後始成立維瓦留(Viarium)僧院社區(約在五四〇或五五三年)，使其成為以聖經為研究基礎的宗教研究中心，並且推薦世俗學者和基督教學者的著作和研究給僧侶們，以便對聖經有較確當的了解。為支持此項研究計畫，他設立了一座大圖書館，加上其個人的藏書——他捐獻給僧院的圖書——一些歷史上著名文獻的原稿，包括希臘文的和拉丁文的，世俗的和基督教的，這些都是他從世界各地蒐集而來的。他為了抄寫基督教和世俗文獻，並翻譯希臘文作品為拉丁文而設置了經典抄繕室(scriptorium)；經典抄繕室的各種出版品遂使圖書館更加擴大和充實。由於身兼讀者、編者，和作者三種身分，加氏為自己的工作訂下崇高的標準，同時其組成一座規模龐大且蒐藏繁富的圖書館的熱忱，使得許多古代的著作，包括宗教的和世俗的，都能獲得保存，否則在當日擾攘的時代，該批圖書可能早已化為灰燼了。

在西方其他地區，連年戰火和侵略所造成的環境極不宜於從事各種文化活動，但在西班牙，塞維爾城(Seville)主教以塞多爾(Isidore，卒於六三六年)的學術著作，主題範圍廣泛，充分表示其涉獵層面廣大，並可窺知塞維爾圖書館的館藏全貌。以氏最淵博的著作，書名為「辭源」(Etymologiae)，係一部文藝和科學方面的百科全書，包羅古代人類的衆多知識，形成當時的標準參考圖書，為絕大部分僧院圖書館所蒐藏。

雖然加西道拉斯可能被尊奉為「僧院制度具有教育、編輯、評論，和抄錄使命之創始者」，然而知識的保存和傳遞，自廣義的觀點言——文學、史學、修詞學、文法，和天文學，還有聖經和歷代教長的著作——濫觴於七世紀前期，西北歐洲的僧院拓展時期。

愛爾蘭與不列顛

由於未遭羅馬人征服，愛爾蘭的部族、農業的社會事實上並未受外來武力騷擾，直到八世紀古斯塔地那維亞人(Norsemen)入侵為止。公元四三一年，有位主教銜命自羅馬來此開辦一座教堂；次年，派垂克(Patrick)肩負着歷史性基督教化的使命前來此地。

第六世紀時，出現許多僧院，包括 Clonard, Clonmacnois 和 Bangor，所有僧院中，知識自始就受到鼓勵。拉丁文是教會使用的語文，但愛爾蘭的方言仍使用於日常談話和文書之中。在五世紀和六世紀時，聖經稿本、神學典籍，以及世俗作家的著作都已傳入該國。在較大的僧院裏都設有學校，校中招收有衆多的生徒，從七世紀起更招收外國學生。聖經、教長著作、拉丁古典名著、數學，

和天文學皆在研究之列。聖經有拉丁文的和希臘文的，而携回歐洲大陸的純古典拉丁文聖經則來自愛爾蘭。

在愛爾蘭各僧院經典抄繕室中發展出一種民族書法和民族藝術，而抄本書籍首度的偉大進展也由此起步——此類書籍都富有精美的書法暨圖案，以及細緻的刻工。事實上，抄本藝術已達到崇高的地位，當時尚未有能超乎其上者，「凱爾之書」(Book of Kells)一書，是一本抄寫於第八世紀代表愛爾蘭書法和圖案的精品，並被公認為是愛爾蘭經典抄繕室所完成最富麗的抄本。

富有苦行精神、求知熱忱，和傳教士精神，都是愛爾蘭僧侶的特色。他們是早期中古時代最偉大的傳教士，將福音(Gospel)、知識和工藝傳入蘇格蘭、英格蘭北部，和歐洲，並且設立了許多僧侶中心，使知識保持不衰。

傳教士中最著名者為聖哥倫巴(St. Columba)，他曾在愛爾蘭創設好幾座僧院，其中包括 Durrrow 和 Kells，後來又赴不列顛(Britain)北海濱的愛奧那島(Iona，約在五六年)建立一處僧院，並附設有經典抄繕室和圖書館。以愛奧那島為起點，愛爾蘭傳教士向不列顛北方推進，在挪桑布瑞亞王國(Northumbria)的 Lindisfarne 地方成立了一批僧侶之家的最早一處。Lindisfarne 遂成為不列顛東岸的知識活動中心；教堂和宗教之家林立於挪桑布瑞亞王國全境各地；而且在學校中，愛爾蘭牧師不僅以基礎知識還將高深知識傳授英國子弟。愛奧那島的僧院及其附屬的館室都以其圖案書籍聞名當世，尤以書名為「道柔之書」(Book of Durrow)的拉丁文福音(Latin Gospels)最為著名；至於 Lindisfarne 福音，是本拉丁文聖經譯本，是最具愛爾蘭塞特(Celtic)風格時期的挪桑布瑞安(Northumbrian)出版書籍最偉大的傳世珍本。

在班高(Bangor)一所僧院中，還有一位名喚哥倫班(Columban)的愛爾蘭僧侶，將愛爾蘭的基督教傳到歐洲大陸，並在法國北方設立許多僧院，包括盧塞爾(Luxeuil)僧院，該院日後成為當時最宏偉的僧院和重要的著述中心。他最後的一處僧院是在公元六一四年興建於意大利亞平寧山區(Apennines)的巴比奧(Bobbio)，僧院附設一座圖書館和一所工作繁忙的經典抄繕室。他的信徒曾在法國設立柯比大修院(Abbey of Corbie)，又在瑞士的聖伽爾(St. Gall)建立僧院，兩者到第八和第九世紀都成為宏大的著作中心。巴比奧僧院、柯比大修院，和聖伽爾僧院三者都與盧塞爾僧院維繫有密切關係，並繼續承襲愛爾蘭傳統和習俗的強烈影響。

愛爾蘭的僧侶、教師，和朝聖者(Pilgrims)前往歐洲大陸時都隨身帶着書籍——其中不僅有聖經和使徒傳記，還有他們自己的有關神學的拉丁文著作，以及學校教學使用的各學科書畫，其中有許

多都有插圖上的精品。世人知悉此類著作幾乎全靠保存於歐洲和英格蘭的複製本，因為大量稿本都在公元八世紀北歐海盜（Vikings）掠奪愛爾蘭時，破壞教堂和僧院暨其附設圖書館與學校時而告散佚。

當愛爾蘭的傳教和文化活動在蘇格蘭、不列顛北方，以及歐洲大陸展開之際，羅馬教堂派遣一位傳教士前往英格蘭南方，及至公元五九七年，僧侶奧古斯汀（Augustine）又在肯特（Kent）王國登岸，並在堪特伯瑞（Canterbury）建立教堂。自五九七年之後，此一教堂與不列顛和意大利之間保持持續的關係，朝聖者和觀光客經常帶回書籍和抄本。在次一世紀，在西奧多爾（Theodore）和哈德連（Hadrain）王朝（約在六六九年），堪特伯瑞學校竟成爲一所教育中心，吸引了衆多學生。所教授的有希臘文和拉丁文，圖書館充滿西奧多爾和哈德連王從羅馬運回的抄本，其中包括希臘文和拉丁文著作，還有許多以前英國從未所聞的神學和世俗作品。

在第八世紀時，班尼第克主教在挪桑布瑞亞王國建立 Wearmouth 和 Jarrow 聯合僧院，由於多次前往羅馬旅行，班主教強調要保護大量圖書才能充實圖書館的館藏，此項作法其後一直爲繼任者所遵循。就是藉着此項龐大的藏書，才能使早期中古時代最著名的神學家，且是學識淵博作家的聖比得（Saint Bede）有可能完成其等身著作。

正如愛爾蘭教堂一樣，英國教堂也派遣傳教士前往歐洲大陸，其中最聞名者是 Boniface，他有「德國使徒」（Apostle to Germany）之稱，且是組成許多僧院的巨匠。他最雄偉的僧院稱作福爾達（Fulda），興建於八世紀，是德國當時一所知識與文獻中心。該僧院的圖書館因獲得英格蘭所捐贈的抄本以及院內經典抄繕室所抄繕的複製本而使館藏益加充實。

在加西道拉斯去世後大約一個半世紀，起初時是由愛爾蘭本身，稍後則與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共同成爲西方知識傳遞者和保護者的主流，並且是「整個未來查理曼帝國境內有決定性的文化因素。」

三、查理曼帝國之文藝復興

「在古代史與近代史的中點，查理大帝（Charles the Great）處於發源地的地位。在查理大帝之前的中古時代各世紀，已經記載了古代學術機構的衰微及其消失，自此之後緊接到文藝復興和改革時代，火約又經過數相當的世紀，寫下了近代史的準備工作。因之，舊事物秩序的終止，和新事物的開始，查理大帝成爲由古代跨到近代世界史的中堅人物，也就是吾人所稱之「中古時代。」

查理大帝統治時期（查理曼大帝，七六八至八一四），由於極力提高臣民教育和文化水準而光耀史冊，爲西歐帶來教育暨文化的成長時期，以及宗教與世俗學術的復興。查理大帝最先注意改進僧侶

的教育，作爲其教育計畫的根基，然後將其關懷擴展到「依照其個人能力能够接受教育的所有臣民。」

阿昆（Alcuin），原係挪桑布瑞亞王國約克（York）地方的校長，以教學績優馳名於不列顛，經查理曼大帝徵召來指導其教育計畫。公元七八二年，阿昆榮任設於 Aachen 的皇室學校校長，開始在法蘭克（Frankish）王國建立教育中心與宣揚教育的使命。在阿昆領導之下，學校紛紛設立，教育改革相繼實施，撥款給僧侶去設立學校，要他們去教育自由民和奴隸出身的子弟。在他所著「中世紀的精髓」（Minds of the Middle Ages）一書中，泰勒（Henry Osborn Taylor）稱此一時代爲「中世紀的求知時期」，指出：「整個時代都在求知，……爲教義而求知，爲傳遞古代文化而求知。」

經典抄繕室設立於各僧院和許多大教堂內；圖書館成爲各宗教機構的必要部門；並且開始實施一套關於選擇、蒐藏、與抄寫學術文獻的策畫周詳的系統。供文學使用的通常拉丁文業已恢復功能，精美書籍的正確抄本也已問世。一種稱爲 Caroline 小寫字體的新字體已經發展完成——此種字體廣泛使用於拉丁文抄本中，其後成爲金屬活字，被早期印刷商用之於印刷拉丁古典著作。

阿昆自皇室學校退休後，即歸隱於都爾（Tours）的聖瑪丁（St. Martin）僧院，此爲王國內歷史最久且基金最厚的僧院之一，他引入文理科學的研究，正如起初在約克學校，嗣又在皇室學校所加強執行的一樣，務使該僧院成爲一所教育中心。爲了支援他的教育計畫，他派員到約克學校去將以前他擔任校長時所使用的學術著作移來僧院，因爲約克學校的圖書館是當時基督教國家中最著名的圖書館之一，而且以擁有一切學術知識而蜚聲一時。

除了他的教育計畫之外，阿昆還親往經典抄繕室監督原稿抄寫工作，即便墨點、拼法、和字體等細節都密切注意。此等工作方式被視爲抄繕人員的典範，歷傳數十世代。

「阿昆（Alcuin）深深體認到：知識寶藏係寄託於少數圖書之中，他從自以爲負有大責任，將此等而未遭筆誤或誤解所破壞的抄本傳遞給後世。因之，在其能力範圍之內，他用盡各種方法，竭力使後代居於有利的地位，獲致受教的機運，以充分而正確的抄本舊籍來保障它們，經他親手訓練過的教師來解說，儲存於教堂，並受到民權的保護。」

這種由查理曼大帝支持，經過阿昆發起與指導的教育復興，就稱之爲「查理曼帝國文藝復興」（Carolingian Renaissance）。由於改進的教育活動在所有教育方面都已展現出新的利益，甚至在查理曼帝國部分喪亡之後，教育方面的利益和文學的培養仍得以保持不輟。「由於查理曼帝國學者們的努力，拉丁歷史才能終於獲救……，任何留傳到第八世紀的事物都一直保存到今天，爲我們所利用。」

查理曼帝國文藝復興的結果並未擴展到法蘭克

王國以外地區，但是過了一個世紀之後，阿夫瑞德王 (King Alfred, 871-899) 嘗試在其威塞克司 (Wessex) 王國內仿效推行查理曼大帝在法蘭克王國所實行的各種措施。他聘請外國學者前往威塞克司王國，以更廣闊的尺度重新引介教育，並且成立一所學校招收其家族子弟，包括他自己的王子、貴族子弟，甚至貧家子弟，都教授他們閱讀拉丁和本國語文。由於當時只有少數人能夠讀懂拉丁文，大多數人都只懂本國語，阿夫瑞德王的教育計畫中便包括了將拉丁文著作翻譯為本國語文的項目，而阿夫瑞德王本身即曾翻譯過數本著作。在九世紀後期整個第十世紀中，在學校、僧院，和抄寫稿本的經和典抄繕室等方面，威塞克司王國都是英格蘭的文化樞紐。

四、經典抄繕室

此一時期保存原稿的圖書館發展史與抄寫稿本的經典抄繕室的歷史是不可分的；這兩者也都是西方僧院制度發展史的一部分，因為「早期歐洲文化遺產能得以繼續傳遞後世，是藉基督教的傳播力量所使然。」

每一座稍具地位的僧院都擬訂有抄繕稿本的規定，通常是設置一間經典抄繕室。按理說來，抄寫量最多的經典抄繕室都屬於設有大型圖書館的僧院和大教堂。第八世紀晚期和第九世紀的圖書館目錄顯示：大多數重要僧院的成立條件都需要蒐藏大量的稿本。自查理曼大帝時起，抄繕宗教著作和拉丁古典作品的風氣就被後世進行成習，較大的僧院都擁有許多抄手，其中有部分抄手只管普通抄錄，另有部分抄手則受過書法和揮圖方面的特殊訓練，抄繕冠絕後世的精美典籍。此種抄繕技藝網羅有當代許多一流名手，除了生活在僧院之內者以外，俗世抄手也經常由於特殊抄繕任務而應邀進入僧院。許多僧院將某一作者或某一特殊著作抄繕成許多複製本，並將部分複製本分贈給其他僧院。「這種在公元七五〇年至八五〇之間大量製作副本的作法，才使學術界能倖免於後一世紀的災禍，而將文化遺產留傳給後世。」

七世紀和八世紀的愛爾蘭、不列顛，以及歐洲大陸的經典抄繕室已如上述。其中有些在九世紀時甚至更趨活躍，重要者如：巴比奧 (Bobbio)，柯比 (Corbie)，聖伽爾 (St. Gall)，和都堡 (Tours)；而它們的圖書館也亦步亦趨，日形擴展，顯示出在宗教與世俗典籍方面都擁有龐大館藏。歐洲地區還有許多僧院和大教堂的經典抄繕室，從其借用稿本抄寫的頻繁情況，證明他們之間在工作上維持有密切的關係。

雖然部分經典抄繕室到十世紀時已呈衰微景象，另有一些例如：聖伽爾 (St. Gall) 和 Fluery 等則變得更具活力。他們繼續借用稿本，許多現存的十世紀時抄本證明當時經典抄繕室的活動，及其在傳頌查理曼文化中所占的地位。

五、拜占庭帝國

拜占庭帝國的國庫充裕而人口眾多，其所繼承的文化可以追溯到發明文字的時期。由於政治上、智力上，和文化上的成熟加以「承襲希臘與東方的知識，以及羅馬政治傳統」的影響，它並未經歷到任何「黑暗時代」。約有長達十一個世紀之久，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倖存於蠻族的侵略和阿拉伯的進犯，成為八、九、和十等三個世紀內「世界上最穩定而文明的國家，並且由於它的存在，才使得來日文明得以延續。」

從七世紀中葉至九世紀中葉，世俗文獻出版的數量寥寥無幾。因破壞偶像而引起的爭論事件終於使君士坦丁堡大學和許多學校招致關閉的命運。許多僧院也被封閉其財產被充公；此種情勢使希臘僧侶憑藉其所擅語文與文化到意大利去尋找避難之所，從而使西方人士瞭解了東方知識。在此時期，聖經或宗教典籍之中並未採用插圖，只在抄繕某種稿本中採用抽象的文字和圖案。

到九世紀後期，宗教爭論事件風波業歸平靜，而君士坦丁堡大學也再度恢復，成為研究古代希臘典籍的中心。求知慾的復甦激發出蓬勃的文學活動；在嗣後三個世紀中，古代希臘典籍陸續刊行，註釋相繼撰述，希臘文獻的類編和摘要編輯完成，百科全書與專門字典也相繼問世。雖然此類著述鮮有新穎或獨創的見解，可是對古典學者和文化史學家而言，它們確是無價之寶。

「拜占庭文獻之特殊且不可抹殺的貢獻即在保存希臘的語文、語言學，和考古學。如果君士坦丁堡當時沒有對亞力山大城、雅典城和小亞細亞地區的學校中聚藏豐厚的希臘知識善加保護之責，……如果勤奮的抄手當時未能埋頭苦幹增加古代希臘典籍的數量，吾人今日就難以想像古代文學或文化如何能夠復活。如果說他們對今日吾人最大的功勞實是既無創新也無才華，此語並無矛盾之處。他們的特質的確應該算是吾人之損失。像他們那麼愚蠢且迂腐，他們必恭必敬地重複不朽人物的話語。但如果他們沒有如此做的話，那麼那些不朽人物老早就與草木同朽了。」

六、阿拉伯帝國

將近六世紀末葉時，一股新興東方宗教與新興政治勢力在先知穆罕默德 (Mohammed) 領導之下於阿拉伯崛起。穆氏信徒稱爲回教徒 (Muslims) 係一向尚武的宗教勢力。由於決心征服世界，阿拉伯人於是開始襲擊拜占庭帝國，在第七世紀就已擄取大部分敘利亞 (Syria)、巴比倫 (Babylonia)、美索布達米亞 (Mesopotamia)、波斯 (Persia)，和埃及 (Egypt) 等地區，然而君士坦丁堡仍足以抗禦其攻擊。隨後又揮兵西指，阿拉伯占領部分非洲和西班牙的土地，不過七三二年企圖侵襲法蘭克王國之際，在都爾遭迎擊。在二個世紀之內，阿拉伯成立了帝國，西起颯爾大西洋的西班牙，東與中國交界。阿拉伯不失爲了不起的征服

者，可是對圖書館發展史的貢獻則只居於採用者、保護者，和傳播者的地位，由他們將大部份的數學和科學知識西傳到歐洲。

在第八和第九世紀，俗世文獻的研究與創作在君士坦丁堡都陷於停頓狀態，巴格達(Bagdad)乃形成希臘典籍的研究中心。當巴格達逐漸擴充成爲一個大都會的時候，許多醫生和學者紛紛前來研究並翻譯希臘的醫學、科學，和哲學典籍成爲阿拉伯文，有時也根據古希臘文或阿拉姆語(Aramaic)譯本而不根據希臘原本翻譯。此項翻譯運動在亞巴息(Abbasid)王朝阿瑪蒙大帝(Al-Mamun)領導之下而達於巔峯；曾於公元八三〇年成立一所具有圖書館、研究院，與譯書局綜合性機能的學術機構，名之爲「智慧之宮」(A House of Wisdom)，學者們前往小亞細亞和君士坦丁堡去蒐集資料，即使回教徒與拜占庭帝國之間相互仇視，兩國間的貿易與旅遊關係仍能維持斷斷續續的關係。醫藥、數學，和自然科學等尤其受到重視，甚至柏拉圖(Plato)、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伽林(Galen)的著作也都譯成阿拉伯文。翻譯典籍的時期大約延續達一個世紀之久，終止於公元八五〇年代，繼之而起的是關於占星術(Astrology)、煉丹術(Alchemy)，和魔術等方面的創新著作。

在亞巴息王朝的歷代經營下，巴格達的發展躍乎君士坦丁堡之上成爲文化活動中心，以擁有多所大學和百餘家書店而自豪。在其武力征服路程中，阿拉伯人學到了中國人造紙的秘方，於八世紀開始在巴格達城生產紙張，而此時西方各地仍在使用羊皮紙，甚至紙草紙的階段，造紙方法在回教徒嚴密把持之下持續達五個世紀之久，由他將這種技術帶到阿拉伯帝國的各角落。由於紙張價格低廉，供應充裕，比羊皮紙或紙草紙便於書寫，因之，書籍出版數量直線上升，大型圖書館也從而紛紛集。各回教寺院和學院之內都設有圖書館，在夕拉茲城(Shiraz)，在伊朗中南部)的圖書館成立於十世紀後半期，館藏圖書皆列入目錄，裝入書籍，並有專人負責管理。據說十一世紀時開羅(Cairo)回教教主的圖書館擁有藏書大約十五萬冊之多。

當阿拉伯文化在回教徒帝國境內向西部擴展時，許多希臘典籍的阿拉伯譯本也傳入西班牙(Spain)，而西班牙回教徒統治者仍遵循保護學者以及創立學校和圖書館之措施。哥多華城(Cordova)圖書館即係公元十世紀燦爛的文化中心，蒐藏圖書達四十萬冊之多。在哥多華、杜利多(Toledo)、塞維爾(Seville)等地的圖書館中，凡已經從古希臘文語翻譯爲阿拉伯文的希臘古典典籍都保存完好，迄公元十二世紀學者將之翻成拉丁文並將之携往歐洲大陸的新興大學爲止。

七、十字軍

一〇七八年耶路撒冷城(Jerusalem)被回教徒

世界的統治力量(塞爾柱土耳其人Seljuk Turks)占領，引起了十字軍(Crusades)；十字軍東征起初純係宗教戰爭，目標只在光復被異教徒占領的基督聖地而已，首次十字軍於一〇九五年由教皇烏爾班(Pope Urban)領導發起，支援拜占庭帝國謀求奪回耶路撒冷，終於在一〇九九年光復聖城。此外尚有多次十字軍東征前後綿亙逾兩世紀。

十字軍的名義和意念終於延伸至對抗東方回教之外，而成爲一種遠征。類此的戰役係第四次十字軍，本來命令進軍埃及，但後來轉向君士坦丁堡，十字軍人員終於在一二四〇年占領該城，並將之收入版圖。雖然難以數計的文學作品和圖書館建築斷送在攻城的猛烈戰火和破壞中，許多稿本也告散佚，但是許多希臘典籍包括亞里斯多德的原版著作在內，卻也因此而數量激增的傳向西歐。

十字軍刺激了貿易，使產品和金錢得以流通，從而引發出新的活動與企業，結果在城堡和僧院周圍或河道兩岸漸次形成許多城鎮。許多農民生活日漸改善，終於得以解除農奴的枷鎖。到了十二世紀，有些城鎮已經實行自治政府，也有些已爭取到限度的自由。商人階級日漸抬頭，爲謀求相互支援和保護而組織各種同業公會(guild)。技工(artisans)和藝匠(craftsmen)也援依商人的成例組織公會，因之，公會組織成爲當日社會、政治、經濟及工業等方面生活之重要部分。

以圖書館學研究者觀點言，十字軍戰爭最重要的成果就是讓十二世紀的歐洲能和東方業已發展的高度文化相接觸，從而展現出新意念、新知識，和新文學。

八、大學的興起

經濟上與社會上的改變導源於新型城鎮的興起，貿易與工業的擴展，而市政機構和個人自由的增長，必然促進藝術、文獻、科學，和思想等方面顯著的發展與進步。

查理曼帝國瓦解之後所造成知識黑暗的世紀，終於讓設於理姆斯(Rheims)的教堂學校和西歐十二世紀最傑出學者Gerbert的教學帶來的光明所趕走。由於Gerbert氏的影響，教堂學校始得於十一世紀時在法國各城鎮建立，並使教學工作在許多僧院中再度恢復其重要地位；雖然當時可用的知識總量相當不足，但是在求知的興趣和渴望方面已有明顯的增長。十一世紀知識最先獲得顯著增長的是醫學方面，係源於沙來諾(Salerno)這所早已名滿歐洲的醫學學校開始採用以拉丁文轉譯希臘醫學典籍之阿拉伯譯本時。在次一世紀初葉，羅馬法律研究又在波隆那城(Bologna，在意大利北部)受到重視。

自十二世紀中葉起，西班牙成爲阿拉伯所保存希臘科學、哲學、醫學，和地理等典籍從阿拉伯譯本轉譯爲拉丁文的翻譯中心，也是阿拉伯近代著作中心。此類拉丁翻譯都傳送給十二和十三世紀歐洲

的學者，以及已經設立的新興大學，因之使學術界的知識及現況大有改觀，從而進一步刺激原已普遍的求知慾。

由於受到大教堂學校拉丁文法和其他基礎學科的影響，使用日常用語著述的興起以及社會上和經濟上更有利的條件，加速了求知狂熱，並形成一種環境，使許多學生不避長途跋涉周遊四方，追隨某位碩學鴻儒從事深奧學術研究。此時，已有相當數量的教師和學生定期在固定場所聚會，從而形成了高等學術機構之基礎。起初，此等學術機構並沒有自己的土地或永久房舍，然而漸漸地教師依照其學術範圍聯合組成院系，並經宗教或政府當局核准可以頒授學位。波隆那、巴黎，和牛津等地的大學可謂固定的高等教育機構的典型，即係由學生前來遊學和個別教師所演進而成的。意大利、法蘭西，和英格蘭等國首先建立的大學被西班牙和其他西歐各國相繼效法，建立其本國的高等教育機構，因之，至中世紀結束之際，歐洲已經約有八十所大學。

教育和書籍管制一度由僧院掌理，此時則移交給教區僧侶 (seular clergy) 和大學負責。書商 (stationarii) 經大學指定或監督，要擔保書籍內容正確並儲存教學使用版本無誤的圖書現貨，隨時供學生租用。只要學生有能力租用所需的圖書，對圖書館的需要就可減低；不過由於學生人數增多，各大學即不得不成立圖書館，此時學生使用的捐贈圖書皆由教師提供。最重要的大學圖書館之一係 Robert de Sorbon 捐獻給他在十三世紀設立於巴黎的一所神學院者，後來該神學院成為巴黎大學之一部分。

最後，每一所大學中的每一所學院皆有其專屬的圖書館。較為重要的圖書都以鐵鍊固定在閱覽桌上，不過有些圖書館則將鐵鍊加長，俾便學生可以携往他要研究之處使用。

九、方言和文學之發展

除了學者和學生之外——在十一、十二，和十三世紀由於社會的、經濟的，和文化的變遷所產生的新興社會之中——還有構成封建社會貴族階級的武士和地主、市民，日耳曼 (Germanic) 暨斯堪地那維亞 (Norse) 入侵者，以及塞爾特人 (Celts) 暨羅馬人等，他們大都對拉丁語文既不操用，也不了解。他們也曾感受到學習的興趣，但是可供他們自己享用的文學，却必須形諸於他們日常生活所使用的語文。由於出版過「冒險故事之歌」 (chansons de geste)，「故事詩」 (Fabiiaux)，以及抒情詩人和敘事詩人的詩文，法蘭西就成為此一方言文學活動中心。方言文學的其他例子有英國的史詩「百阿吳夫」 (Beowulf)，冰島 (Iceland) 的「古代文學集」 (Eddas)，德國的敘事詩「尼白龍根之歌」 (Nibelungenlied)，以及西班牙的「席德」 (El Cid)。中世紀的意大利文學因但丁 (Dante) 寫出「神曲」 (Commedia-Divine

Comedy) 而達於巔峯，但丁可以拉丁文寫作，但也能用意大利文寫作，於是使得意大利方言也成為宜於文學表達的語文。

十、文藝復興

十四世紀是拜占庭帝國多災多難的時代，對於西歐而言，亦復如此。鄂圖曼土耳其 (Ottoman Turks) 勢如破竹的軍隊使拜占庭帝國的希臘學者都望風而走，爭相逃離君士坦丁堡，往意大利尋求棲身之地。他們都身懷許多古代學者的稿本，當然深大地理學者歡迎，意大利學者並鼓勵他們開辦學校來受意研究希臘與拉丁學術。

君士坦丁堡飽受鄂圖曼土耳其的蹂躪竟長達一個世紀之久，最後在公元一四五三年屈服，而拜占庭帝國也告壽終正寢。對於君士坦丁堡在文化方面的貢獻，有位學者追憶道：

「東方帝國 (即拜占庭帝國) 的首都在抵抗東方蠻族的戰役中，多少世紀以來擔當護衛歐洲文明的責任，表現得相當堅強；從而扶持西方的新興國家，使其日漸發展茁壯；同時將歷史悠久的希臘文獻寶藏存於安全無虞之地，俟諸新興國家文化充分發達後再予傳授。」

吾人不可過定：因有君士坦丁堡之喪亡而觸發文藝復興，不過事實很明白，由於君士坦丁堡堡壘才能使許多希臘典籍及拉丁文獻在歐洲廣為傳播，這的確大大有助於佩脫拉克 (Francesco Petrarck 1304—1374，意大利詩人)，包伽邱 (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意大利作家)，以及其他諸賢所倡導之知識覺悟。

十一、文藝復興在意大利

佩脫拉克 (Petrarch, 1304—1374) 被後人所讚頌的是「墜愛意大利的土地，去接受希臘文化」，佩氏是體認到古代拉丁和希臘文獻之知識與文化價值之先知。被推崇為人文主義之父的佩脫拉克使得中世紀文化具有宗教的虔誠，去崇敬和讚賞古代文明。他到被人冷落的僧院圖書館中蒐集古老的稿本，許多久經散佚的古代拉丁文籍由此而重見天日，其中有西塞羅 (Marcus Tullius Cicero, 106—43 B.C.，羅馬政治家、演說家，及作家)、昆提連 (Quintilian)、普勞特 (Plautus)，以及盧克瑞夏 (Lucretius) 等的著作。佩氏將其私人圖書館捐獻給威尼斯市 (Vence) 的聖瑪克 (St. Mark's)，希望該館能由威尼斯市政府妥為經營，但此番苦心並未得償。

包伽邱 (Boccaccio) 因受佩脫拉克的感召也鑽研拉丁古典典籍，並且還學會希臘文以便直接閱讀希臘學者的原著。為能繼續尋求稿本，包氏遍訪所有僧院，抄繕古典典籍復本，並親往泰西塔斯 (Tacitus) 門下受業，泰氏所著「史學」 (Histories) 一書後世公認係包氏在蒙提卡錫諾城 (Monte Cassino，在意大利中部) 所發現。在尋訪古代稿本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布拉修里尼 (Poggio

Bracciolini)，他曾在聖高爾城（St. Gall）、克朗尼（Cluny），以及法蘭西與德國尋遍所有的僧院，找到許多早期拉丁文典籍。僧院生活的沒落，繼之以城鎮與大學的興起，遂使得圖書館益受忽視。珍貴稿本都無人理會，任憑塵封，飽受風霜，甚至有些僧院中，稿本的書頁已被扯破，或者整本稿本已被割裂，予以出售。據載：包氏目睹提蒙提卡錫諾城的稿本落得如此下場，不禁「號啕痛哭」，至於布拉修里尼也曾在聖高爾城發現許多稿本堆積於教堂鐘樓（towers）之內，任其霉爛。

意大利文藝復興，又稱為「人文主義時代」（Age of Humanism），此一運動特色即在於求書若渴、永無休止的搜尋古代希臘和拉丁學者之稿本；滿腹熱望、煞費苦心的揣摩經典作者之本意；選定目標、悉力模仿其風格與形式；大型圖書館盡量購置稿本以便保護典籍並供應讀者。「此一時期可謂一段儲積的時期，充滿毫無批評、不必分辯的熱忱。凡屬典籍稿本概受尊崇。不論優劣與平庸，皆能無分軒輊，博得垂愛。批評之風尚未開始。」

佛羅倫斯城（Florence）成為意大利文藝復興中心。麥地錫（Cosimo de Medici）是當日最有力量之倡導者，前後逾一世紀之久，宣導生活富裕的中產階級支持希臘黃金時期以來的文化輝煌發展。麥氏統治時期到公元一四六四年為止。他是一位稿本蒐藏家、抄繕者，和人文主義的熱心倡導者。他派遣臣下分赴世界知名之地去探尋各種古典經籍

，並且如願以償地蒐集到大部分拉丁古典著作。麥氏曾興建聖馬可女修院（San Marco）圖書館，並以其私人藏書為基礎成立了偉大的麥地錫圖書館（Medici Library），現則歸藏於佛羅倫斯城的勞倫提恩圖書館（Laurentian Library）。麥氏之孫勞倫鄒（Lorenzo）亦係藝術家、作家之熱心倡導者暨知識愛好者，秉承其祖父志業，繼續蒐求稿本，鼎力充實麥地錫圖書館的館藏，並且興建宏偉的專事典藏希臘暨拉丁古典名著的佛羅倫斯城圖書館。

人文主義時代亦屬發現與探險的時期。在試圖拓展一條通往東方的新航海路線以取代因拜占庭帝國崩潰而遭中斷的陸路交通孔道的努力中，狄亞斯（Bartholomew Dias，西班牙人）在公元一四八八年繞道非洲南端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意大利人）在一四九二年登陸美洲大陸，以及伽馬（Vasco Da Gama，葡萄牙人）於一四九八年經由好望角抵達印度（India）。

公元一五二七年羅馬遭到劫掠之後，許多稿本蒐藏受到損毀或散佚，許多藝術家和學者不幸避難或者被迫流亡國外，遂使文藝復興中心移轉到歐洲北方，並在該地發展出一種傳遞知識的新興媒體，此一新興媒體將使古代知識——以及所有各種知識——便於全體人類所運用。

（上文接第40頁）

to Journals in Education-CIJE 中，該刊是「教育研究」月刊的姐妹刊物。

教研月刊所公佈的文獻，都是「教資中心」各個「交換所」所搜集，基於品質及易讀性而予以甄選、編目，再加索引、撰述摘要等工作，然後傳送到中央資訊中心處理和參考部，納入電腦資料庫中。全部工作從選擇到刊登在「教研月刊」上大概要二到三個月。

「教研月刊」的讀者包括整個教育機構（如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和視導人員、學生、學校董事、教育研究員、工商團體和公眾），這可由期刊包括各類型和來源的文獻而得到證明。

「教資中心文獻複製服務」（EDRS-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是處「教資中心」傳播網中文獻供應和傳佈的單位，所有在教研月刊公告的非版權文獻（和任何取得複製許可的）都送到文獻複製服務中心，製成縮影捲片或轉換成國際規格的4"×6"的縮影單片。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從「文獻複製處」得到「教資中心」文獻的複本，如縮影單片（1/24）或紙張複印（原物大小）。訂購單件或長期訂購，訂戶

可預訂所有的縮影單本（每個月大約有一千四百個單片包括九百五十個書店），或收集分套（如某一交換所搜集的所有書名），平常都有五百個以上的團體訂購同一類的教資中心的全部收集品，這些團體有聯邦機構、大學和學院、州和地方教育機構、學校機構、職業團體、非營利團體等等。國外有三十多個訂戶，個別的用户如教師、教授、學生、研究員、規劃員、行政人員、諮詢者、心理治療者，和無數教育團體中的成員。

在「教研月刊」中公告的每一文件都記有「文獻複製服務處」的價格（或其他供應單位名稱），個別所需縮影單片依標準價格出售，訂購紙張複印本則依數量多少累進收費，長期訂戶的價格比個別訂購價格較低，以鼓勵長期訂戶。

期刊公告和發行彼此協調進行，也就是當月期刊到達時，縮影片的訂戶亦能收到完整的當月單片。只要讀者有興趣的項目不必耽擱就能在閱讀機上讀出，這種不必等待訂購程序即時的反饋，說明了為什麼那麼多人寧願要訂閱而不要分批購買。

簡言之，「教資中心文獻複製服務處」構成教育文獻的永久檔案保存所，使研究的結果不會再如以前那樣的在寄出原件之後便消失無蹤或絕版。